



唐代文学研究

(第十四辑)



主编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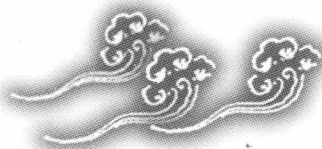
◎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文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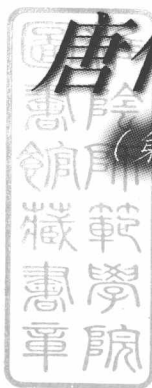
(第十四辑)

Tangdai Wenxue Yanjiu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文学院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淮明师院图书馆 1515278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学研究. 第14辑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文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95-1832-6

I. 唐… II. ①中… ②西… ③广…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39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22.25 字数: 660千字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900册 定价: 6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唐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明非	李 浩	陈尚君	尚永亮
荣新江	赵昌平	莫砺锋	陶 敏
阎 琦	傅璇琮	葛承雍	葛晓音
董乃斌	詹福瑞	薛天纬	戴伟华

《唐代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 浩

副主编 李芳民

执行主编(第十四辑)卢盛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放	卢盛江	刘 石	刘 宁	刘明华
刘真伦	朱玉麒	李 浩	李芳民	李德辉
沈文凡	吴承学	吴相洲	张伯伟	张采民
杜晓勤	杨国安	杨晓霭	陈 飞	陈才智
陈友冰	罗时进	查屏球	胡可先	徐 俊
钱志熙	陶新民	康 震	淡懿诚	傅绍良
程国赋	蒋 寅	谢思炜		

目录 MU LU

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中的唐代文学	董乃斌(1)
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摘要)	陈尚君(8)
20 世纪唐诗研究的几点反思(摘要)	吴相洲(13)
大雅的失落与召唤	
——唐代诗人的盛世论述与王道想象(摘要)	廖美玉(18)
关陇集团与隋唐之际的文学观念(摘要)	康震(23)
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摘要)	胡可先(28)
唐代琴曲《胡笳》研究	沈冬(33)
物象的“诗化”和意象的“实化”	
——以唐诗中的“径”为例	朱易安、王书艳(60)
唐代粤西生态环境与贬谪诗	张明非(73)
长安文化与唐代都城诗	魏景波(85)
唐代咏史诗与高丽文人李奎报	金昌庆(98)
唐诗中的吴体诗刍议	景遐东(115)
初盛至中唐间“古乐府”概念衍变刍论	长谷部刚(124)
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续补考	卢燕新(136)
诗句图的传统与文学的活用	琴知雅(145)
唐诗接受过程中的化用现象初探	沈文凡、全崑(159)
从《全唐文》看唐代文人传记创作的自觉意识	毕宝魁(169)
论唐代厅壁记的文献价值	吴河清(180)

- 唐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及其与碑志文之关系 吴夏平(193)
- 《文笔式》——初唐一部重要的声病说著作 卢盛江(204)
- 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摘要) 钱志熙(219)
- 论武后、中宗时期文馆学士的诗学成就 陈冠明(224)
- 略论作为文本的正仓院藏《王勃诗序》 道坂昭广(239)
- 初唐边政与边塞诗主调的流变 陈友冰(248)
- 布衣诗人与盛唐诗坛 丁放、袁行霈(271)
- 日本宫内厅藏《张说之文集》研究 朱玉麒(285)
- 岑参对唐诗西域之路的双重建构 海 滨(305)
- 千年一曲唱《阳关》
-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 王兆鹏(334)
- 高丽文人笔下的王维 金世焕(347)
- 储光羲与《河岳英灵集》 戴伟华(361)
-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
- 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摘要) 薛天纬(374)
- 出山与入山:李白庐山诗的精神底蕴 萧丽华(378)
- 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 李小荣(412)
- 饮中八仙之聚散与天宝文学走向(摘要) 胡 旭(425)
-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关系研究 葛景春(430)
- 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考论(摘要) 查屏球(445)
- “近世性”与中唐文学 刘 宁(450)
- 唐开成年间齐梁格诗考论 杜晓勤(467)
-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
- 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尚永亮(489)
- 韩愈《师说》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摘要) 吕正惠(505)
- 柳集百家注作者及刊刻时地补证 刘真伦(509)
- 白居易《长恨歌》之文本形态及主题新考 陈 翀(521)
- 《长恨歌》与中唐的美意识
- “好色”与“风流” 诸田龙美(535)
- 白居易《时世妆》考论 田 苗(551)

赵秋谷之白傅论平议	陈才智(564)
宦游风景与家族地图	
——李德裕辞赋之花木书写及其文化解读	许东海(582)
略谈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	吴在庆(596)
新旧《唐书》李商隐传“三十六(体)”为“三才子”讹误考说	
.....	莫道才(612)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	查洪德、罗海燕(623)
《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的诗学主张与诗学史意义	
.....	王友胜(636)
王夫之的诗歌评选与唐诗观	蒋 寅(646)
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研究	
——以赵彦卫的“文备众体”说及其指涉的相关议题为主	康韵梅(660)
西子的经典形象与被褻之俗及魏晋隋唐的女性观	刘 航(679)
“龙城”续考	赵望秦(692)
《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补遗	刘明华、王飞(697)
编后记	(705)

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中的唐代文学

董乃斌

引言

中国文学史贯穿着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这是对中国文学史贯穿线的众多表述之一。

两大传统共同起源于人类表达和交流的需要。声音、手势、身体动作和语言、图画等既是叙事的工具和媒介，也是抒情的工具和媒介。而文字的出现则对两大传统的形成和传承有着根本的促进作用。

从一开始，两大传统的关系就是共生、并存、同荣、互补、相得益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你是你，我是我，既不能分割又有所区别。

描述、研究这两大传统是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两大传统当然可以分而治之，目的是将它们各自的内涵、特质弄清楚；但更需要的是统合研究，即将两大传统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弄清它们的区别与关系，尤其要弄清它们那不能分割的一面。总之，研究者需要建立中国文学史存在两大传统而不是仅有一个传统的概念。这一研究既与作家作品有关，也与文体有关，与文学史整体有关。

我国古代的（或曰经典的）诗学建立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上，本质上是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阐述，其影响一直延至今日。而对叙事传统则阐述得很不够（一个标志是多以为叙事传统仅与小说、戏剧相关，所以叙事传统要迟至宋元以后才开始）。这种影响的弊端在今天看得越发清楚——由于未能以两大传统贯穿中国文学史，遂使中国文学史面貌失去完整性，内部发生断裂，使当代文学研究不能与古代文学研究很好地衔

接,不能从中国文学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审视当代文学的状态情貌和成败得失,因而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补课,补上详尽描述阐论叙事传统这一课,然后将两大传统放在一起考察研究,以便更全面完整地认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不是割裂的文学史,而是古今贯通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简述

文学的源头是口头创作,其包含抒情与叙事两部分。

中国文学史抒情传统可从上古民谣和《诗经》算起,叙事传统可从甲骨金文纪事和《诗经》、《尚书》、《春秋》等算起。它们被后人分为经、史、文等类别,但实际上浑融合一,难分彼此,几乎同样古老,难分先后。它们的发展也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

历史记载是中国文学史叙事传统成长发展的主要领域,中国古史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刘知几《史通》所谓“六家”(六种史体)无不如此。而以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最为典型,因为《史记》的列传显示:人的命运成为它的关注目标和表现重点,这与文学的宗旨完全一致。

古代文人喜爱笔录,这一习惯催生了种种野史笔记、琐闻杂传类著作,也就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在诗歌领域,叙事因素也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乐府民歌和文人的仿效之作中。

当然,文史二科自身的特点在发展中逐步呈现,到一定阶段,各自产生“独立”(也可称为“自觉”)的内在要求。于是,史学首先摆脱经学而独立,文学也努力宣示标榜自身特色(个性化、情感色彩、辞藻韵律之美等)。延至南朝齐梁,文学界明确提出把历史记述驱出美文范畴,《昭明文选》只收史赞,不收史文。史家亦强烈要求史述与文学划清界限,初唐刘知几《史通》深刻论述了文史之别。

唐代是中国文史两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之前二者是天真朦胧的浑融,之后都想独立发展,实际上也确实分途前进、各自成长起来,故有了更明显的差别和学科分际。然而,中国古代文史又实在难以分家,即使在各自发育壮大,甚至成熟老化之后,仍然无法切断其血缘关系,犹如一对

孪生老兄弟,面容或因岁月沧桑之蚀有所不同,体内基因却总是一样。唐以后的中国文史仍然呈现出浑融之态,不过也许可称为命定的无奈的浑融。

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中的唐代文学

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如果能够把它置于中国文学两大传统发展的态势中观察分析,或能找到研究的新视角,开创出某种新生面。

从这个角度看,唐代文学研究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现象。试述如下:

第一,历史的书写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重要源头,许多古代史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唐初开史馆编写史书,共得《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后皆被列为正史。它们继承、延续并发展了自古以来史述富于文学性的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的情况文学史著述并不如此。除《史记》、《汉书》外,至多再加《后汉书》和《三国志》,即所谓“前四史”被不同程度地写入文学史,其余正史皆被排除在外,这几乎已成定式。这显然与文史两科在发展中的分离趋势有关。然而,文史作为学科固应分清,文史著作大部分应有明确界限,这也不成问题。但某些具体作品的跨学科性质又是客观存在的,上述诸史即是如此。当然,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文学性分量不等,且各有具体表现和特色,不可一概而论。但确实每一部都值得从文学角度仔细分析。这种分析应成为唐代文学史的一部分。

第二,除正史外,唐代产生大量野史笔记类著作。一方面,社会上有很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和逸事传闻;另一方面,文人有笔录故事的良好习惯,口头文学的一部分被文人记录下来,加上文人自己的创作,便形成很有特色的叙事文学作品。比较著名的,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朝野僉载》、《唐国史补》、《因话录》、《中朝故事》、《次柳氏旧闻》、《刘宾客嘉话录》、《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等。这类作品上承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后启宋元明清同类著作,形成叙事传统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这类作品,以往很少被文学史家关注,即使利用,也多取其资料价值,很少重视其文学意义,这是很可惜的。这种情况在今后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应

有所改变。

第三,唐代科举有试赋一目,故赋是唐代文人特别重视的一种文体,许多文人致力于赋的写作,将其视为最能体现文学修养与水准的文体,编录文集也往往爱把赋放在最前面。唐赋种类和数量皆很可观,从《文苑英华》收录的情况即可见出。除通常的文赋、骈赋、骚体赋外,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的律赋更是十分发达,艺术上则各具特色。最值得注意而以往偏偏忽视的是,唐赋浓重的叙事成分和叙事、抒情、议论有机融合的特色。唐赋发展并改进了汉大赋的艺术,它们不像汉赋那样冗长,但环境描写、氛围营造、人物塑造,包括心理刻画却丰富细腻得多,生活气息也浓郁得多,这是两大传统共存共荣的有力证明。唐代不少作家都有赋篇流传,像宋之问、杨炯、骆宾王、王维、李白、杜甫,在文学史上向来并不以赋名家,但都有名赋传世;也有的作家许多作品失传,流传至今且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主要就是其赋作,如张仲素、李程、王起、舒元舆、白敏中等。更有一些在文学史上以传奇作品闻名的小说家,其实还写过不少赋,如《李娃传》作者白行简有《新月误惊鱼赋》、《欧冶子铸剑赋》、《望夫化为石赋》等,《霍小玉传》作者蒋防有《姮娥奔月赋》、《萤光照字赋》、《吕望钓玉璜赋》、《湘妃泣竹赋》等,他们的赋篇都充满想象,善叙故事和对话,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相当鲜明,若将这些赋作和他们脍炙人口的传奇小说联系起来研究,必可相得益彰,从而对其叙事思维和艺术表现的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有一批在文学史上素不提及的作家,在赋的创作上取得可观成就,把他们撇除在唐代文学史之外是很不公平的,像写《效鸡鸣度关赋》、《渔父辞剑赋》的宋言,写《陶母截发赋》、《舒姑泉赋》的浩虚舟,写《斩蛟夺宝剑赋》、《蔺相如全璧赋》的独孤授等,在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上都是应占一席之地而以往被忽略的。此外,唐代骈体文章及其在抒情、叙事方面的种种表现和贡献,也值得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单独深入的研究,其理与唐赋之应受重视相同,故不再赘述。

第四,唐朝许多文人担任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之类的官职或做过使府幕僚,奉命撰写各类应用文章,并因此获得文名和在文坛上的地位。如张说、张九龄、元稹、李德裕等,在当时被称为“大手笔”,俨然文坛领袖,对其时文学创作潮流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的这些文章在当时

属于公文,但后来收入他们的文集,承认是个人创作并拥有著作权。这类文章具有实用性,但也不乏文学性。中国古代文章的实用性从未成为文学性的对立面,二者绝非“有你无我”的关系,因为某些文章在当时具有实用性就无视其文学性,反映了思维的片面和狭隘。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实际功用的文类,如碑志、书启、序跋等,它们的文学价值也应该放在两大传统交融互渗的关系中来观照阐发。确认此点有助于促进对唐人文集的全面研究,促进对唐代乃至中华文明的全面认识——实用性文章也具有文学性,正是中华文明在古代曾经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以前按所谓纯文学观将它们视为“非文学”而排除在文学史叙述之外,未免武断,现在则应根据新的大文学观把它们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至于某些具有应用性、实用性价值的文章,如墓志碑文,特别是新出土的墓志碑文,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意义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识。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文体的文学性更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到唐代终于从子书和史著中脱胎,获得独立,其载体就是脍炙人口的唐传奇。这是真正的小说创作,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唐传奇研究成果颇多,但这个领域还有许多研究课题可以进行,特别是小说文体与当时其他文学体裁错综复杂的关系,尚有不少新义需要深入探索。

第六,诗歌、散文在唐代取得辉煌成就,以往文学史研究比较充分。如何在研究质量上有所出新、更上一层楼而不仅仅是数量徒增或原地踏步、冷饭重炒?这就尤需开拓新视角,提出新问题。若然,则从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的角度来考察观照,便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比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在全部唐诗和唐散文中所占地位与分量如何?又如,那些以抒情、议论著称的诗文作品中所含的叙事成分如何,其叙事与抒情之关系又如何?唐新乐府在两大传统发展中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我们均须留意关注并拈出阐述。唐诗和唐传奇关系至为密切,则是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共存互补、相得益彰的最佳证明。相信抓住这个角度,将会在这个开垦已久的领域中发现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课题,而且必将把唐代诗文研究推向深入。

第七,唐代出现了一大批既精于叙事又擅长抒情的作家。许多诗人

虽以抒情诗创作著名,但他们的作品并不乏叙事成分(从杜甫、元白、张王到郑嵎《津阳门诗》、韦庄《秦妇吟》等)。散文家更多叙事或叙而后抒议之作(韩愈、柳宗元固可为代表,但还有更多作家对此作出贡献),纯议论或纯抒情的文章也有(如韩愈的《五原》),但不是很多。专门的传奇小说家之外,沈亚之、杜牧都是兼精抒叙的大作家。从两大传统互动、相益的角度研究唐代作家,大有可为。而且我们还要思考和解答古代作家的创作从偏于抒情走向较多地叙事和抒叙结合的原因,特别是深层心理动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在古代文学发展中是一个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也是从上古文学到中古近古文学,直至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古代文学研究如欲与当代文学发生关系,如欲对当代文学产生影响,这是一条可行的通道。

第八,敦煌文学(如变文、俗赋)本身是叙事作品,又影响了后世的叙事文学,如话本、说唱和小说。它不但在叙事传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是两大传统交融的一个方面。敦煌文学的研究应可从文献的发掘整理,进至文学性、文学价值的阐释,以之丰富对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的认识。

第九,唐人的文学批评以涉及抒情传统者多,但亦有涉及叙事传统的,应予发掘申论。至于对唐以前文史叙事传统作出深刻总结的《史通》,更应该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的重要依据。《史通》虽是史学论著,但中国“文史一家”的传统使它不可能不涉及文学。更兼刘知几极力想把文史加以区分,以达到其使史学纯洁化的目标,他就不得不努力阐述文史的差异。这样,他就从文史两个方面考察和说明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刘知几代表了唐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中古时代人们的叙事观,又对后世产生过深刻影响。刘知几的叙事观具有划时代的总结性,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

第十,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在唐代达到高峰。但唐代又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叙事传统也迅猛地发展着。唐代不但出现了传奇文体,使叙事传统在文学体裁中获得了自己的最佳承载物,而且叙事性深深地渗入一向以抒情为己任的诗歌词赋和一般散文之中,为下一个阶段叙事文学彻底从文坛边缘进入中心做好准备。中国文

学此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叙事猛进而抒情停滞的状态,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今天。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抒情的声势和地盘也并不是很快萎缩,更深刻的表现是抒情向叙事渗透。文学的抒情和叙事就是这样相互渗透(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叙事向抒情渗透),难分难解,不离不弃,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又呈现出不同的浮沉消长态势,从而形成一部动态的、精彩纷呈的伟大历史。唐代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转折点意义,以往甚少被注意,没有提高到必要的历史高度来认识,阐述得自然不够。笔者认为,这是唐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立足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大传统,而对以往被忽视的叙事传统投以更多关注,这既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需要我们大力投入,持久投入。唐以后,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的发展出现微妙变化,词的繁荣为抒情文学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但发展势头更猛的,是以说话、说唱、传奇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当然,词也有叙事的表现,说话等叙事文学也含有抒情成分,两大传统在文学史发展中虽各有消长,但究其根本仍然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到了更晚,如林庚先生所说的“元曲以来,文坛已是故事的天下,诗文毫无起色”的时代,^①这两大传统依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共存共荣的,只是荣衰的具体状况态势与其在文学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变化而已。

让我们更自觉地把唐代文学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之中,具体而言,是放到中国文学史两大传统的观照角度,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① 林庚:《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382页。

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摘要)^①

陈尚君

从20世纪30年代孙望、王重民、闻一多等前辈开始唐诗辑佚的工作,至今已经接近80年。有关唐诗辑佚的专著出版了多种,与此相关的考订辨伪、增补辑佚论文为数甚丰,有关的专题研究也多方位展开。笔者近期得暇整理了相关文献的总目,并希望借此对各家辑佚之得失,古籍数码化为唐诗辑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唐诗辑佚对于改写文学史之意义,略申所见,以就正于方家。

《全唐诗》收诗缺漏,在其成书后不久,朱彝尊著《全唐诗未收书目》就曾指出,但在其后200多年,居然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为《全唐诗》作具体的补遗工作。只有远在东瀛的学者市河世宁利用日本保存的典籍为《全唐诗》补遗,成《全唐诗逸》三卷,补录128人诗66首又279句。中国学者的唐诗辑佚工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始有实际的展开。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初从事唐诗补辑工作的是孙望先生。1936年,成《全唐诗补逸初稿》七卷,得诗“二百七十有奇”。此稿当时曾有排印本刊布,在学术圈内形成一定影响。此稿后经30多年的增补,到1978年编成《全唐诗补逸》二十卷,共补诗830首又86句。王重民于1934年受北平图书馆派遣到英法作学术考察,又以互换馆员的身份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① 原文刊载于《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

次法藏敦煌遗书目录,有机会完整接触这部分第一手文献,1938年又赴英国阅读伦敦博物院所藏敦煌卷子,先后历时5年,得以完成《补全唐诗》的初稿。后人在他身后整理遗稿时,又发现多种敦煌遗诗的抄校稿,并陆续予以发表。闻一多的唐诗辑佚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发表,直到1994年《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二稿印出,其辑佚工作方为世人所知。其体例显然是拟汇录各家的唐诗辑佚,他本人的新得佚诗数量不算太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将《翰林学士集》、《会稽掇英总集》及敦煌遗书中诗加以采录。童养年利用长期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成《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所得凡550家1000多首,其采集文献范围极其广泛,尤以《古今图书集成》和地方文献为大宗。

1982年,中华书局将王、孙、童三家辑佚稿四种结集为《全唐诗外编》出版,以王重民《补全唐诗》为第一编,以同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为第二编,以孙望《全唐诗补逸》为第三编,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为第四编。各编有重复者,则以上述各编为次第,存前而删后;同一诗而出处不同者,则后见者存目。从全书来看,童辑删落较多。

《全唐诗外编》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老一辈学者唐诗辑佚工作的结集,为学者提供了自《全唐诗》成书以后近280年间中国学者辑录唐诗极其可观的收获,并在其后较长时间内,引起许多学者进一步考证唐诗和继续辑佚的兴趣。

笔者1981年下半年开始有关《全唐诗》的文献来源和文本订正的工作。由于在追求文献之全备、考订之深入、人事之推敲、真伪之鉴别诸方面都作了超过前人的努力,实际的收获远远超过最初的预想。1985年初完成《全唐诗续拾》初稿,得唐人佚诗2300多首,已经超过《全唐诗外编》的规模。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初审后,提出修改意见,并同时约请笔者修订《全唐诗外编》。这两方面工作历时一年,到1988年秋交稿,1992年出版时统名为《全唐诗补编》,共三册,其中第一册为原《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孙、童两编都有较大幅度的删削,并在书末附修订说明逐一交代考订意见。后二册则为《全唐诗续拾》。全书收录唐五代佚诗约6300首,而拙辑即达4600多首。能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在文献搜索范围和复核仔细程度方面,都较前人有所突破;(2)重

新界定诗文的界限,否定《全唐诗·凡例》认为佛道偈颂赞咒不是歌诗的偏见,将存世佛道二藏中的有关作品作了较彻底的清理;(3)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学者唐诗辑佚的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辑佚工作并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当时已经发表的成果。

拙辑《全唐诗补编》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唐诗辑佚第二阶段成果的总汇。

近20年来,在唐诗辑佚发掘方面最杰出的工作应该首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其首次完成了中、英、法、俄及散见敦煌遗诗的辑录,所录诗达1800多首,其中绝大多数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而《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未收之诗在千首以上。其对中外已有研究成果能较充分地吸收,在作品归属和作者考订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

此外,最近20年在唐诗文献方面较重要的发现有以下几项:(1)韩国所存旧本《夹注名贤十钞诗》收唐五代三十家七言律诗三百首,其中有百余首佚诗;(2)俄藏敦煌遗书中有蔡省风《瑶池新咏》残卷的发现;(3)长沙窑瓷器题诗有更进一步的发现;(4)日本古写本陆续有唐诗佚篇发现;(5)一些以往流通较少的古籍中,也有成批佚诗的发现;(6)一些宋金元时期以及韩国人的集句中保存的唐诗佚句,较零碎。

二

相较一般典籍辑佚来说,唐诗辑佚的学术难度要高得多。具体来说,一是涉及一代文献的网罗,面广量大,各种典籍引录丰富,筛检不易;二是流布广泛,家喻户晓的同时,文献引录或口耳相传造成的讹误也极其严重;三是唐诗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历代有意无意的伪托现象也层出不穷,很难彻底究诂。

笔者与许多前辈一样,在缺乏科学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人工检索和记忆来从事唐诗辑佚,虽然也很认真总结《全唐诗》和前辈辑佚中的规律性误失,但仍不能避免重收误收。拙辑《全唐诗续拾》现在已知重收误收300多则,虽然仅占全书的1/20,但已很可观。由于用书条件和检